

人物素描



伍柏麟:在人生起伏中别裁政治经济学

□本报记者 周俊生

和新中国共同成长

伍柏麟是和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在新时期对重建政治经济学大厦卓有贡献的学者。

1947年,伍柏麟考入国立暨南大学,师从陈彪如教授学习经济学。从美国哈佛大学回国不久的陈彪如带回的是美国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回忆起昔日陈教授在课堂上的风采,伍柏麟说,是陈教授缜密的思考,严谨的逻辑,清晰的条理,通俗的语言,严谨的学风,培养起了自己对经济学的兴趣。

当时的中国,虽然抗战已经胜利,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接收大员的贪婪,天文数字般的物价飞涨也使伍柏麟这位青年学子深感不平,他在1949年3月参加了一个叫“雷社”的组织,解放后才知这是暨大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为此他晚年享受到了离休待遇。说起这个经历,伍柏麟谈道

地说,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成了“老干部”,不到1%的“革命付出”,却获得了100%的“革命成果”,这在政治经济学上被称为“搭便车”。

1951年,伍柏麟被分配到震旦大学当教师,两年后随着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来到复旦,担任蒋学模教授开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的助教。一年后,他又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进修班学习。在那里,他系统地学习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3年没有一个寒暑假回沪,最后带回复旦的是一张全优的成绩单。

正值英年的伍柏麟,渴望着把自己的学识传给下一代,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经济学人才。但是,从反右派开始,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高等学府的课堂变成了战场。伍柏麟不断地经历着下乡劳动的折腾,他在农村结交了大量农民朋友,但教书育人的愿望却不得不付诸东流。

探索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四人帮”粉碎后,被严重破

坏的高校开始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而这时国内高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却是一片空白。在教育部的组织下,复旦大学接受了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任务,由蒋学模教授担任主编,伍柏麟参与了编写。巧得很,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候,供经济学科使用的南方十六校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也开始上马,伍柏麟也被邀请参加编写。

编写适合新时期使用的教材,首先着手拨乱反正的艰苦工作,而这种拨乱反正也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展开的。最初时,所谓的拨乱反正其实还是回到传统的苏联教科书的模式,因此“左”的痕迹依然很明显,这本教材也经历了多次修改。

1983年出版的第3版复旦版《政治经济学》教材,在蒋学模教授的主导下,开始对体系结构作了较大的修改,抓住垄断这个实质去阐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国内垄断、国际垄断和国家垄断的理论,大胆舍弃了传统的所谓资

本主义总危机的分析。但是,伍柏麟总觉得,这还是以前的“帝国主义论”的老框框,难以说明变化着的资本主义现实。

正在这时,伍柏麟接受了复旦大学另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程》的主编任务。在这本新编教材中,伍柏麟对资本主义部分的结构作了新的探索,分为社会经济、商品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几篇,按照逻辑顺序和从抽象到具体、一般到特殊的叙述原则来安排。这一体系突破了在我国应用了几十年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资本主义部分的体系,体现了商品经济是几个社会共有的关系。

伍柏麟构建的理论体系虽然曾经一度引起争议,但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1988年,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推出第5版时,伍柏麟的不少观点都被吸纳其中,新增了不少符合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研究成果。这一次的修改加强了对现代生产力的阐述,在

此基础上说明资本关系的变化;以资本社会化为主线构建体系,而不再用垄断及其表现来构建体系。事实证明,这一次修改极富建设性,以后这套教材虽然经常有修改,但是这个基本体系一直保留到了第11版都没有作大的改动。这本教材被全国各所高校广泛采用,发行量达1800多万册,创下了全国高校教材发行量之最,先后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10多次。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伍柏麟特别兴奋,因为他觉得,经济学本是贴近生活的,经济学的教学也不能游离于生活之外,要用市场经济理论武装新一代的学子。1993年,由他担任主编的全国第一本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校教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程》出版了。它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并形成了独特的体系结构。《教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很快被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等指定为研究生教材,并在第二年获得上海市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与自己的学生同行

伍柏麟毕生都在教书育人。20多年前,他出任复旦经济学院管教学的副主任,他确定的教学方针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和应用;编辑不同要求、不同课程的系列教材,从《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到经济学基础等;鼓励学生投身实践进行调查研究。正是在伍柏麟教授的大力倡导下,复旦涌现出了一批与西方经济学发展潮流息息相通年轻学子,成为今天活跃在复旦经济学界的中坚力量。提倡“与自己的学生同行”的伍柏麟,也因此得到了学生们的厚爱。在他80华诞的时候,学生们出资为他编印了《伍柏麟教授已画留影》。

如今,年事已高的伍柏麟又接下了主编国家“十一五”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前沿研究”丛书的重任,目前已有三本著作出版。

来自日内瓦

从圣诞购物潮看年节消费热

□徐文惠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圣诞新年假期快要结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热潮的结束,相反在仍是销售旺季。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个消费旺季的特点,或许对中国读者新年购物还是有启发意义的。

这里我们向大家推荐在节日后值得买的一些商品,如电子产品、大型家电、汽车和冬季服装等,还有就是小孩子玩具。以大型家电为例,厂商通常会在节日期间大规模促销和打价格战,经销商也想尽快把节日期间促销的产品快点出手,因此他们更有可能会打折扣,从八折到五折不等。

当然,今年是购买电脑和笔记本的一个好年份。因为微软的最新操作系统VISTA霸主时代已渐渐到来,许多电子产品及其他无法运行VISTA的电脑很可能会被逐出市场,商家们也很有可能把一些功能稍逊的台式机及笔记本打折出售,“功能稍逊”实际上也只对少部分人来说是,但对大多数人并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如果你可以忍受没有VISTA的生活,圣诞及新年后你绝对可以淘到便宜的电脑。

除了电器产品外,你还能找到一些价格很划算的保暖衣物。如果冬季是一个暖冬,御寒衣物肯定会打折。一些不错的卖家正在低价出售秋季的热销服饰,其中有些折扣会比圣诞节打得更低。

节后购买食品也是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国外,最好的选择有火鸡和鸡禽类食物,还有苹果之类的冬季水果,及豆类的一些冬季蔬菜。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酒类了。现在是买酒的最佳季节,你可以用最少的钱买最好的酒。

你还可以考虑购买一些夏季商品。在冬季里买季节商品,错季的效应可以帮助你省下很多钱。如果你考虑再买一些像样的东西,根据你的需求你也可以省下一笔,从5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

如果你想买车,也可以在圣诞节后的日子逛逛车市。在国外买车的最佳时机是每月月底,车商会在月底出手多余的库存。而今年的车市前景并不太好,车商们更喜欢在年底促销,这样看来你绝对可以在年底买到便宜货了。

不过,在你购买这些商品之前,你还要好好想想你到底需要什么,因为很多商品的出售政策都不同。800美元以上的大商品,你可能会拿到几百元的折扣。如果遇上厂家希望节后尽快出手一些商品,那么你还可能获得更多的商品折扣。

这样看来,如何在圣诞新年节后买到更多价廉物美的商品,还是有些窍门的。所以,西方国家的圣诞新年假期结束,恰恰是一个消费旺季,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和眼光,肯定能买到喜欢的超值商品。

多声道

金融三难待解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消费率过低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协调平稳发展的突出问题,国际收支不平衡导致的货币政策自主性下降。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较快,金融在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同时,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二是农村金融体系的结构与运作机制还不适应市场需要;三是金融宏观调控面临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准备金上调旨在预警信贷反弹

马骏(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进入2007年,国有银行获得了新的信贷投放额度。经验表明,银行普遍参照“早投放早获利”的原则,通常会在年初时积极放贷,因此信贷和投资反弹很有可能出现。本次央行上调准备金率旨在进一步收紧市场流动性,对可能出现的信贷反弹予以警告。市场充沛的流动性主要来自贸易顺差,这种局面在今年很有可能得以维持。

多棱镜

企业团队智商陷入低谷 受伤的会是谁

□钟国兴

“团队智商”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关注。搜索网络,一些网民对于诸如“诸葛亮团队智商过低”的问题非常感兴趣,一股从团队智商角度重评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潮流正在涌动。

在我看来,股票投资人更应关注企业的团队智商。因为一个企业团队智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企业是基业长青还是会像肥皂泡一样突然破灭,而这正是股民的利益所在。某些企业不能保证配好这样巨额资金,最后股民就成了受害者。

所谓团队智商,就是一个团队中能够释放出来的智力,在相互抵消之后,同该团队人数的比值。有的企业领导人个人智商很高,团队智商却很低,因为你没有给别人的智力释放提供空间。就像刘备——诸葛亮的团队,尽管诸葛亮智商高,但整体上智商却很低;曹操的团队能够发挥许多智囊人物的作用,因此智商就很高。

一般来说,一个企业创业初期团队智商往往比较高。因为创业的老板大多平民出身,在创业尚未成功时,不会有高

因此,今年上半年央行还将上调1至2次存款准备金率。

准备金上调 是为了避免股市泡沫

陶冬(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从2007年1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次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并非针对实体经济,而是旨在吸收市场流动性,避免资本市场出现泡沫。此举也旨在针对资本市场,表明管理层对近期股市升幅和民众参与程度的担忧。

今年将研究制订 医药卫生改革方案

高强(卫生部副部长):今年将积极研究制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从创新体制机制入手,加大政府投入,严格执业监管,维护公益性质,减轻群众负担。今年要继续大力加强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和社区卫生建设,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控制疾病流行,减少疾病发生。同时,切实加强医疗卫生服务管理,加强人员培训和医德医风教育,提高服务质量,保证医疗安全,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雨人摘编)



本期人物话语

央企要成为健康股市的推动者

李荣融(国资委主任):到目前为止,中央企业控股的194家上市公司中,已有191家完成或正在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占总数的98.45%。中央企业要成为健康股市的推动者。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

刘大中的不凡与不幸

□梁捷

近年来,人们对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建议愈发不满,于是开始问这样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世界上到底是什么水平?中国有没有世界级的经济学家?更有好事者预测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间表,到底需要五十年还是一百年?

有一个人的名字现在不大听到了,他没得过诺贝尔奖,可他很多同事、朋友、学生都过得奖,他也是《新帕尔格雷夫大词典》条目中的唯一中国人。他叫刘大中。

刘大中是江苏武进人。常熟自古就是文人荟萃的地方,刘大中又出身于书香门第,学习成绩异常优秀。1936年,他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转攻经济学。1940年,他在康奈尔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年仅26岁。

我们只需举出一项指标就足以证明刘大中的不凡。迄今已有百多年历史的《美国经济评论》是美国经济学会主编的学报,世界排名第一的经济学期刊,一般学者若能在上面发表一篇论文,那么各个名牌大学的聘书就会纷至沓来。截至今日,在上面发表论文的中国人依然屈指可数,可1941年,年仅27岁的刘大中就在这本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他是第一个在这本学报上发表论文的中国人。

1936年,刘大中出国时,中国刚刚放弃了银本位,采取复本位制并与美元挂钩。可是没过多久,中国经济就因为抗日战争陷入了大混乱,货币政策几乎无人过问。可是人民总要生活,总要交易,即使在无政府的地方,市场也会自发地生成。上海是当时金融中心,又是沦陷区,政府能力所不及,外汇黑市就在上海蓬勃地发展起来。

刘大中虽然身在海外,但最拿手的研究就是统计分析现实经济状况,再加上他对中国国民性深刻地了解,所以准确地把握黑市上的供需关系分解成十二种类型,分析它们对中美实际汇率的影响。战时的经济是特殊的经济,几乎完全不能用教科书上主流的均衡分析方法去讨论。刘大中的手法让人耳目一新。而且,刘大中还试图为解决中国现实的经济混乱出谋划策,或者为战时经济提供一个大致稳定的替代方案。他提出,现实目标就决不能仅仅是稳定货币,而必须做出更大的全盘考虑。刘大中这篇文章在世界经济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从一开始,刘大中的学术命运就已注定,是要在一片混乱乃至废墟上绘制新的经济蓝图。

抗战结束,刘大中迫不及待地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百废待兴,经济百孔千疮,经济学更是一塌糊涂。刘大中一面在学校里教经济学和统计学,一面就组

织人手调查了解中国实际经济情况。国民政府对此两眼一抹黑,内忧外患之下,对于各地的经济矛盾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刘大中获得很多确信的数据后,和他的好友蒋硕杰一同小心地提出一些政策建议,被他的康奈尔老学长胡适看到,大为叹赏。可在当时的局势下,刘大中和蒋硕杰空有一腔热血和满脑子经济计划,却无从实施。

1948年,国民经济已经陷入崩溃边缘,上海的通货膨胀不可收拾,统计信息也非常匮乏,这恰好给刘大中展现身手的机会。1965年,他和叶礼嘉博士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合著了《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在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顿时在西方学界引起轰动。这本书成为了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经典。弗里德曼等现代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也总以这本书作为主要依据。30年代社会经济状况是刘大中亲身感受过的;40年代的情况则是刘大中积极投入、试图改变却不得;到了50年代,刘大中只能在大洋彼岸默默注视,根据零星零点的线索来苦苦推演。这本书研究的历史跨度有多长,刘大中积累的心血就有多深。直到今天,对于中国那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状况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很多重要数据还没有披露,但刘大中这本书的地位仍然无人可以撼动。

50年代,台湾大学聘刘大中为教授,“中央研究院”聘他为院士,多次请他回来帮助台湾制订经济政策。于是,他在台湾培养了很多学生,指导了编制台湾的统计年鉴,亲自参与设计了台湾的税制改革。刘大中要挽回大陆经济的梦想没有实现,转而在台湾这样的弹丸之地小试牛刀,取得极大成效。我们现在回顾台湾经济起飞的历程,怎样表彰刘大中的贡献都不为过分。

可惜的是刘大中并没有完全见到这一切。1975年,他检查出了肠癌,于是携妻返回美国,回到他心中的学术圣地康奈尔大学。流落于湖光山色之际,刘大中仰药自杀,其妻袁亚昭亦服药身殉于侧。